

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
互動與交融

巫 鴻 主編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1

編輯委員會

楊 泓 馬世長 巫 鴻 羅世平
李裕群 蔣人和 李崇峰 汪悅進

EDITORIAL COMMITTEE

Yang Hong Ma Shichang Wu Hung
Luo Shiping Li Yuqun Katherine R. Tsiang
Li Chongfeng Eugene Y. Wang

BETWEEN HAN AND TANG:

CULTURAL AND ARTISTIC INTERACTION IN A TRANSFORMATIVE PERIOD

Edited by
Wu Hu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 2001

尼雅學研究的啓示

韓 森

(耶魯大學歷史系)

從 1900 年斯文赫定(Sven Hedin)第一次發掘樓蘭至今，中外學者研究尼雅社會已經整整一百年了。這一百年間，中外考古學家在尼雅、樓蘭一帶共發掘了三處遺址：尼雅、樓蘭與米蘭。儘管所處區域不同，這三處遺址都顯示出相似的文化傳承。斯坦因(Aurel Stein)在尼雅發掘的遺址是鄯善國的精絕古城(精絕是尼雅在公元 3、4 世紀時的名稱)。尼雅、樓蘭的文物雖然不像絲綢之路其他地點那樣宏偉，但是出土的文書和早期文物所具有的獨特之處引起了數代學者的極大關注。早在 1901 年，斯坦因一看到尼雅出土的佉盧(Kharosthi)文字書寫的文書，就意識到研究尼雅具有重大意義。爲什麼當地人使用印度字母書寫文書？尼雅原住民是誰？他們是否信奉佛教？這些問題雖然很基本，但是百年之後的今天，中外學者仍未就這些問題達成可爲大家廣泛接受的定論。假如我們能够解答這些尼雅研究中依然存在的問題，我們將有可能進一步瞭解漢唐之間中國與印度邊疆的文化互動與交融史。

一 如何解釋佉盧文文書的存在？

僅靠出土文書來研究某地居民運用何種語言交流，或使用何種語言書寫是很困難的。假如當地居民原來無字母，研究就更爲困難。

鄯善國出土的文書包括佉盧文文書和漢文文書。它們的分佈區域很清楚：在精絕佉盧文文書多，在樓蘭漢文文書多。樓蘭的漢文文獻明顯與漢魏屯兵有關，尼雅佉盧文文書則與當地地方政府有關。過去很多學者根據佉盧文文書的存在假定貴霜帝國曾統治過尼雅¹，但也有學者對此說法持全面否定的態度²。我在這裏不想重復他們的學術論爭，而是希望提出一些關鍵資料以便拋磚引

玉。

佉盧文不是貴霜帝國內流通的惟一行政語言。貴霜帝國的統治階層使用大夏語(Bactrian)。由於貴霜人原來無文字，他們借用希臘文字來書寫大夏語。Nicholas Sims-Williams 最近公佈了在阿富汗 Rabatak 新發現的貴霜帝國碑文³。據這一碑文的內容，貴霜帝國最有權力的王迦賦色伽(Kanishka)先用大夏語宣佈教文，而後再把它譯成雅利安語(Aryan)。換句話說，國王先說大夏語，再用希臘文字寫成教文，然後他又把教文翻譯成印度當時的白話——普拉克利特語(Prakrit)。普拉克利特語包括多種方言，而尼雅居民說的是其中一種：健陀羅語(Gāndhāri)。健陀羅語用佉盧文書寫。Rabatak 碑文提醒我們，鑒於貴霜帝國當時至少有兩種行政語言，佉盧文文書的存在并不一定能證明貴霜帝國曾統治過尼雅。

歷代學者在探討這些問題時經常在當時的尼雅是歸屬“漢朝帝國統治”還是“貴霜帝國統治”這一點上產生分歧。我認為“漢朝帝國統治”這一說法更為合適，而“貴霜帝國統治”一說則不恰當。由於史料多，我們知道漢朝稅制、兵制及政府機關是如何運作的。而研究貴霜帝國的學者則根本不知道貴霜帝國有什麼樣的政府機構。關於貴霜帝國的史料主要是碑文，而這些碑文中沒有一個提到稅制。貴霜帝國真有其固定的稅制嗎？在沒有史料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推想其答案。也許在提到貴霜帝國統治時，使用“貴霜王朝”這一說法更為適當。貴霜王朝領土有多大？因為沒有詳細的記載，我們只好憑年號推斷，凡使用貴霜王年號的地方就應該屬於貴霜王朝。目前學者已推定了貴霜王朝歷代國王的次序，但是他們尚未能確定任何一位貴霜王的具體在位年代，包括貴霜王朝最有權勢的王迦賦色伽在內。

Sims-Williams 認為，因為迦賦色伽元年應在公元 100 和 120 年之間，所以他在位的時期大概持續至 126 年或 146 年⁴。由於刻有迦賦色伽年號的碑文地理分佈最廣，大部份學者都認定迦賦色伽是貴霜王朝最有權勢的王。由此推論，如果貴霜王朝確曾一度入侵過西域，應該是在他任在位期間的事。可是貴霜王朝真的派軍隊去過塔克拉瑪干沙漠嗎？《後漢書》中載有一條相關的記錄：“永元二年(公元 86 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七萬兵攻超。超衆少，皆大恐。”據《後漢書》的記載，是月氏的軍隊，而不是貴霜的軍隊，到過塔克拉瑪干沙漠。日本漢學家桑原鷺藏和羽田亨早在 30 年代就已經指出月氏和貴霜原來屬於不同的部落⁵。也許我們很難想象貴霜王朝會擁有如此強大的軍隊，但是我們可以因此相信貴霜王朝或月氏部落曾派軍隊到過西域。《後漢書》中還記載道，班超擊敗了貴霜王朝的軍隊，並說班超當時率領的士兵極少。他的小隊士兵是如何打敗對方的七萬之衆的軍隊？我們無法確知。但是對這一問題，我們也許應該換一個角度去考慮當時戰爭的性質：當時的情形或許不是我們平時所想

象的傳統模式的一方軍隊攻擊另一方軍隊的戰爭，而極有可能是班超去西域說服當地國王承認漢朝皇帝。

貴霜王朝權力最大之時，也是漢朝鼎盛之期。到了公元 2 世紀，漢朝衰弱，貴霜王朝也衰弱下來。因此公元 2 世紀關於西域的史料甚少，所以我們無法知道貴霜王朝是否統治過西域。到了公元 3 世紀，即 230 年左右，伊朗的薩珊王朝打敗了貴霜王朝，貴霜王朝崩潰。

尼雅佉盧文文書是貴霜王朝滅亡之後才有的。布臘夫(John Brough)根據他對斯坦因發掘的漢文和佉盧文文書的對比結果，暫且推定 Amgvaka 王 17 年即公元 263 年。他推定尼雅佉盧文文書的形成年代是在 236 年與 321 年之間⁶。以後的學者修正了他所主張的年代，馬雍與林梅村認為 Amgvaka 王 17 年應是 273 年左右⁷。林梅村認為中日共同尼雅遺跡學術考察隊發現的最早的一件文書可能源於 2 世紀中葉，所以他推算鄯善國文書形成於 210 年到 359 年間，歷時約 140 年⁸。

林梅村進一步認為尼雅居民使用佉盧文並不是因為貴霜王朝曾統治過尼雅，而是因為 2 世紀末有一批難民從貴霜王朝移民到尼雅⁹。由於歷史記載不多，我們無法知道有多少人何時去了尼雅。

尼雅出土的文物支持了林梅村的看法。尼雅建築裏的文物都顯示出西北印度的藝術風格特徵。斯坦因發掘的一塊木板上刻有獅身鷹首獸(griffin)、獅子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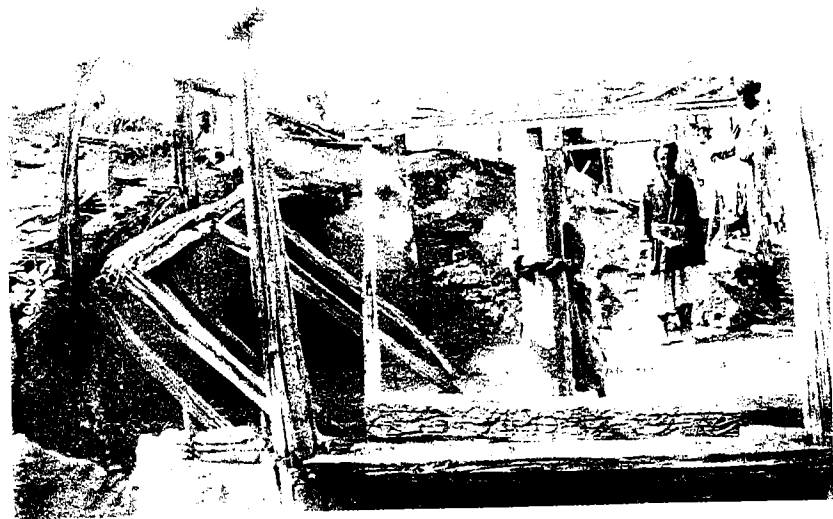


圖 1 斯坦因發掘拍攝的在尼雅遺址 N. XXVI. 出土的刻有獅子和龍合成動物的木板
Aurel Stein, *Senindia*, volume I, plate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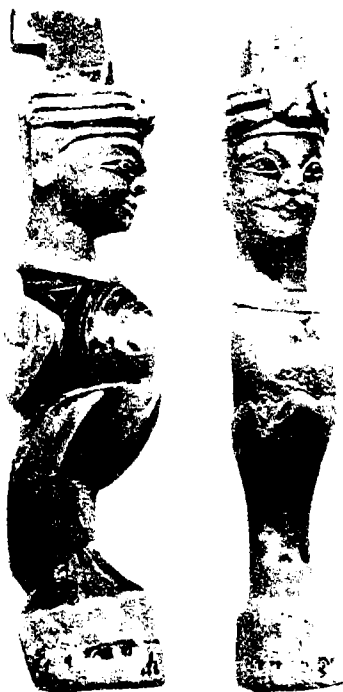


圖2 斯坦因在尼雅發掘的不列桌腿上的
看起來是印度人的不列

Aurel stein, *Ancient Khotan*, volume III, plate LXX.

龍合成的動物。今天巴基斯坦絲瓦特(Swat)地區的木匠還在雕刻類似的木板。瑪麗琳·麗艾(Marilyn Rhie)在她1999年撰寫的重要著作《中國中亞早期佛教藝術》一書中將這塊木板視為中亞藝術品中的精華之作(圖1)¹⁰。尼雅出土的其他木刻也同樣具有印度的藝術風格。例如斯坦因在尼雅發掘的木刻桌子腿上的人像面孔看起來像印度人(圖2)。

1935年布羅歐(T. Burrow)注意到佉盧文文書中尼雅居民的名字和外來詞匯有其獨特之處。由於當時的書記(scribe)使用佉盧文文字來寫外來語的音標,因此文書中載有非犍陀羅語的人名一千左右、外來詞匯一百五十左右。布羅歐發現尼雅居民的名字和他們用的外來語具有吐火羅語的特徵。最早的吐火羅語史料是在克孜爾出土的,寫於6、7世紀。據布羅歐的解釋,3、4世紀時尼雅已經有吐火羅人居住。因為他們用的語言與克孜爾的吐火羅語

略有不同,他推測尼雅吐火羅人是克孜爾吐火羅人的分支¹¹。布羅歐也研究過伊朗人名,結果發現比吐火羅人名少得多。耶魯大學語言學系教授因斯勒(Stanley Insler)則認為吐火羅人早期住在希臘附近,後來移民到塔里木盆地。因此他們的母語更接近東印歐語系的語言,而不太像印度伊朗語系的語言。

佉盧文文書中還包括關於三種非當地人的記載:山地人、于闐人與漢人。關於山地人的史料極少,其中有一件為國王敕諭,“還有,絕不允許精絕人對山地人有不法行爲。”¹²可惜,我們無法從這一記載中得知國王在此是指何種“不法行爲”;關於于闐人,佉盧文文書裏表明他們的身份常是奴隸、佣人或逃亡者;關於漢人,文書表明3、4世紀時在尼雅的漢人並不多,通常為商人,有土地和奴隸,是少數使用金子購物的人。以下引自文書中的一份封牘告訴我們:有一次打官司時,官方因為要等漢人在場才能聽兩方發言而將官司延期。

(封牘正面)

致州長佈軍和稅監黎貝

(封牘背面)

第一行 應阻止蘇耆陀。現在沒有商賈自漢地來,可不必清查絲債。
至於囊馱之事

第二行 應煩勞檀支那負責。待自漢地來的商賈抵達時,務必清查絲債。

第三行 若發生糾紛,聯將於王庭親自裁決¹³。

由此可見,漢人明顯不是常年住在精絕,而是偶爾才來的。以上這些資料告訴我們,在當時的尼雅至少有當地人、于闐人和山地人共同居住,並且不時有漢人商賈來往貿易。他們之間相互交往並相互影響。因此,我們可以說,當時的尼雅社會並不是一元的,而是一個多民族的、包括多元文化的社會。

我們探討尼雅居民所用語言時還要考慮到漢文文書。斯坦因曾在尼雅垃圾堆 N. xiv 最下方發掘出八塊漢簡¹⁴。中國學者王國維很早就注意到了它們:“今尼雅所出木簡十餘。隸書精妙。似漢末人書跡。必在永平以後,所署之人。曰王。曰大王。曰且末夫人。蓋且末王女為精絕土夫人者。”¹⁵其中一塊記載道,“王母謹以琅玕一致問王”;其他簡的內容也大致相同,記載着某人給某人琅玕。琅玕很可能是指用絲繫住的漢簡。王室成員之間相互饋贈禮物可能是慶祝春節的一個習俗。這些漢文木簡的存在並不因此證明尼雅國王家人之間彼此說漢語。他們很可能用漢語慶祝漢人的節日,而不一定在日常生活中用漢語交談。斯坦因在《Serindia》一書中提到了他的錯誤,由於他當時不瞭解這批文書的重要性,所以沒太注意它們原來的的位置,因此至於這些漢簡是否為漢朝末葉的文書,我們無法確定。

總的來說,尼雅居民語言的使用情況可能如下所述:原住居民說吐火羅語而無書寫字母;那些公元1、2世紀從西北印度移民到尼雅的人說犍陀羅語而寫佉盧文文字。2世紀末,尼雅居民開始用佉盧文寫文書。斯坦因發掘的漢簡揭示了尼雅國王至少在慶祝春節時使用過漢語。我們可以推想,在3、4世紀,尼雅居民有的說犍陀羅語,有的說吐火羅語。應該引起注意的是:尼雅與絲綢之路其他地方不同——在絲路其他地方,外來移民漸漸取代了當地居民,而在尼雅外來者與當地人混居在一起。尼雅文書記載的國王和官員的名字是用佉盧文文字書寫的吐火羅語的人名。由此可見,來自印度的移居者到達尼雅之後,當地居民接受了他們介紹的佉盧文文字,但掌握政府權力的仍是當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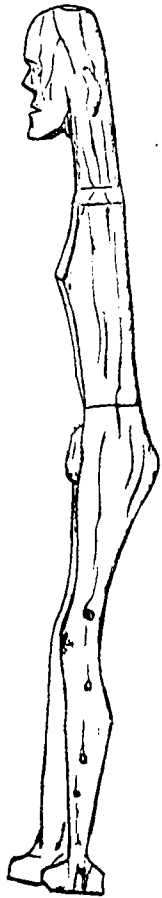


圖3 伯格曼在歐德墓地發掘的木刻男人像

Folke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Plate Vc.

二 移居者到來之前尼雅的物质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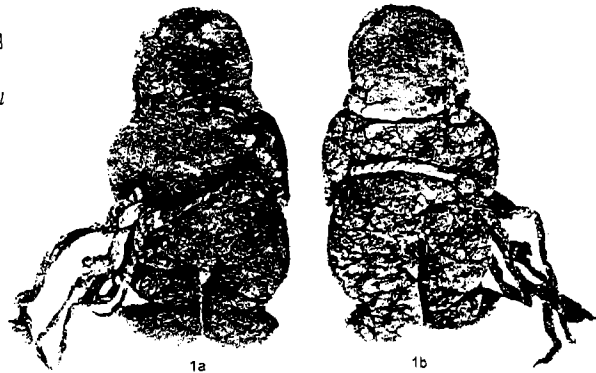
大部分早期的文物都是埋在墳墓裏的。斯文赫定與其合作者於1928-1931年、1934年發掘樓蘭時找到了當地早期居民的墳墓。瑞典的考古隊在羅布泊(Lop Nor)附近進行調查之後，也發現了幾個墓地，學者伯格曼(Folke Bergman)寫了發掘報告¹⁶。多數的墳墓中有中國或印度製造的商品。只有5號墓地(Cemetery 5)未出土中國或印度的商品。此墓地也被稱為歐德墓群(Ördek's Necropolis)，因為是當地居民歐德帶領發掘者去的，這之前他曾盜過該墓群。因為此墓中沒有文書，也沒有進行碳14測驗，所以伯格曼無法確定它的年代。同時由於5號墓地內并無中國或印度商品，伯格曼認為它是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3世紀之間的遺址¹⁷。

5號墓地的形狀很有特色：很多木板分散在沙丘上。因為存放年代久遠，當地古代居民用木板做成船形的棺材，多數均已破裂。伯格曼估計原有的120具棺材之中，只有8具比較完整。在惟一一座沒有被盜過的墳墓5A中，棺裏的干屍高1.55米，穿着毛料衣服和新做的皮鞋。其陪葬品包括裝麥子的小袋子、四支箭和一個籃子。干屍手裏拿著一枝檉柳樹(tamarisk)樹枝¹⁸。棺材裏還有很多麻黃屬植物(ephedra)。斯坦因假定當地居民用該植物來配藥。伯格曼則認為，由於該植物是一種常綠植物，它很可能代表了當地居民希冀永生的願望。

5號墓地最引人注意的是三個木製的人像，表現二女一男。由於這些人像比屍體還要高，因此無法將它們放在棺材裏。它們原來被平放在地上，為了拍照，伯格曼將它們立了起來。他假定這些像是神像，其作用可能是保護整個墳地。其中男像已無胳膊，其生殖器顯然被夸大了(圖3)。此像是否就是當地人信奉的繁殖神呢？5號墓地的沙丘裏還出土了四個陽物模型。每個由兩塊木片組成，以羊毛綫綁在一起²⁰。

伯格曼還注意到，在離歐德墓群不太遠處，另有一座未被盜過的墳墓(Grave 10)。

圖4 伯格曼在樓蘭附近發掘的毛氈作的小人像
Folke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Plate 6.



(Grave 10)。在此墓中，中空的楊樹幹做的棺材有毛氈的裹子，干屍穿着絹面棉裏的襯衫。絹是中國產品，棉是印度產品。這些紡織品證明此墓建造的時代比較晚。由墓中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當時人們關於陰界的基本信仰與早期墳墓所展現出的此類信仰具有連續性。死者左膝蓋旁邊有一塊呈三角形的43×29厘米的棕色毛氈，上面縫有羊骨。羊骨象徵死者在陰界的食物。在死者的外套下有毛氈做的小人像。伯格曼沒有記錄其大小，但他認為此像是死者在陰界的配偶。小人像是裸體的，有一塊陰毛(pubic hair)貼在身上(圖4)²¹。

僅憑陪葬品來推斷某個民族的宗教是很冒險的。假如我要冒此風險的話，我可以推想尼雅當地居民相信人死後去陰界時，能夠帶着隨葬品。因為在陰界他們還會有家庭，還會繼續生兒育女，還需要一般的日常用品，如衣服、靴、食品、箭等等。由此可見，在佛教思想進入尼雅之前，這些信仰已經存在。

三 佉盧文文書中關於宗教生活的資料

佉盧文文書出現於3、4世紀。此時墳墓裏陪葬品雖然比早期多，但是基本的埋葬習慣沒有改變。如果我們只看墳墓的話，不會知道尼雅社會曾吸收了一批從印度來的移民，也不會知道地面上存有佛教遺址。在這一點上，尼雅與絲路其他地方相同，即在墳墓裏看不到任何佛教影響。與早期墳墓相比，此時墳墓裏最明顯的變化是中國與印度商品的增加。例如，中日共同尼雅考察隊在尼雅發掘3號墓時，發現了許多中國製造的絲織品。根據考古學者王炳華的分析，死者為當地貴族²²。他們的彩色高級絲織品上織有“王侯合婚千秋萬歲宜子孫”的字樣。死者不一定懂漢語，但是他們的願望與早期的死者類似，他們

法盧文文書中關於當地居民宗教信仰的信息不多。不過，文書中提到了獻祭動物的習俗。據記載，有一次當地巫祝夢見名叫巴哈特羅(Bhattro)的神不接受當地人獻祭的一頭牛，因此尼雅的大官黎貝耶(Ly'ipeya)下令在一座新橋上重新獻祭一頭牛給巴哈特羅神²³。由於記載有限，我們無法得知巴哈特羅是本地原有的神祇或是印度移居者帶來的神祇。同樣，儘管我們可以從文書中得知尼雅有自稱能釋夢通神的巫祝，但無從知道他們是當地居民還是外來移民。

另外一條重要的資料也與黎貝耶這個人有關。文書記載尼雅官方曾沒收了他的奴婢，因為他的奴婢是巫婆，而他向政府索要賠償金²⁴。當地政府經常處罰巫婆，但是詳細情況不清楚²⁵。除了這些資料之外，法盧文文書沒有其他的關於民間宗教的記載。我們至今無法知道歐德墓地出土的木人究竟有何意義，也無法徹底瞭解當地人有關死後生活的信仰。

四 地面上的宗教生活

在研究當地人宗教生活時，假如我們無視地下文物而只關注地面上的文物的話，我們將會得到完全不同的印象。當年斯坦因發現米蘭的佛教遺址時，他認定尼雅是一個佛教國度(Buddhist kingdom)。他所看到的宗教遺址，包括佛寺、佛塔和佛像等等都與佛教有關。此外法盧文文書中有很多文書提到沙門(Śramaṇa)一詞。如果僅憑這些表面印象的話，我們會覺得尼雅佛教與後來的中國佛教相同：僧俗分離，涇渭分明。僧侶都受戒並且住在寺院裏。但是這些粗淺的表面印象會使我們誤入歧途。下面讓我們先看一下地面上的物證(material evidence)吧。

在精絕，考古學家發掘了一百個漢朝的、五十個魏的居民遺址²⁶。斯坦因在尼雅時注意到尼雅最大的遺址是佛塔，但是奇怪的是，此外尼雅再無其他佛教遺址。關於佛塔的崇拜亦無法盧文記載。我們只能推想：當地居民可能是把舍利子放在佛塔裏，並進行日常佛教儀式。尼雅佛塔高6.3米，基部為兩重方形，上為覆鉢。斯坦因在尼雅居民區也曾發掘到一些小型的佛塔，可能是用於家庭中的禮拜。樓蘭也有類似的大佛塔和小佛塔。考古學者王炳華認為佛塔一般建在寺院附近：“沙丘北部，東側，可以看到紅柳草泥圍籬，桑樹及個別建築構件，說明沙下可能覆埋着古代寺院遺址”²⁷。在印度、中亞和中國，佛塔建在寺院附近是很常見的情形。但據現有材料判斷，當時尼雅的佛教徒很可能是住在自己的家裏，而不是寺院裏，因此尼雅很可能不屬於中印佛教建築那種類型。關於這一點，下文會進一步論述。

法盧文文書中經常提到“沙門”一詞，但是尼雅人所說的沙門與現代人頭腦裏沙門的概念是不同的。我們不應將文書中的“沙門”理解成僧侶，而應理

解成“佛教信徒”。假如一定要翻譯成現代詞匯的話，尼雅人所謂的沙門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俗家佛教徒(lay Buddhists)。他們不出家，而是留在自己的家裏結婚成家，生兒育女，甚至領養子女。關於這些事實的史料記載很多。

精絕的俗家佛教徒貸款，還債，作各種買賣，也會有自己的奴隸。他們不一定穿袈裟。精絕出土的一件法盧文文書是首都樓蘭的上層佛教人士給精絕佛教眾制訂的規則，其文為：

(正面)

- 第一行 精絕比丘僧界的戒律
- 第二行 由施羅[中殘]妥當保存
- 第三行 這枚印張屬於[中殘]人
- 第四行 僧界的[下殘]

(背面)

- 第一行 時惟威德宏大的，偉大的國王，侍中，天子摩習梨在位第十年十二月十日
- 第二行 泥僧界給精絕僧界制定戒律，據說新來的比丘[下殘]
- 第三行 不聽長老的話，不服從老比丘。現在由天子當著各級比丘的面[下殘]
- 第四行 制定這些戒律。長老施羅菩拉巴和菩那色那委任為寺院主持，務必管好僧界[下殘]
- 第五行 一切活動，依法審判，僧界一切活動由他們管理[下殘]
- 第六行 僧界人士應該感到滿意。從今以後，無論哪位比丘，只要不參加僧界活動[下殘]
- 第七行 就要罰絲綢一匹。無論哪位比丘，只要不參加佛教儀式，就要罰絲綢一匹。凡是[下殘]
- 第八行 參加佛教儀式的比丘，不得穿世俗服裝，違者罰絲綢一匹。無論哪位比丘，如果毆打[下殘]
- 第九行 其他比丘，輕者罰絲綢五匹；重者罰絲綢十五匹。無論那個莊園主對僧人[下殘]²⁸

由於佛教信徒參加佛教典禮時如果不穿袈裟，就要被罰款，可以推測精絕的佛教信徒很可能是住在自己家裏而不是寺院裏。

除佛塔之外，斯坦因和斯文赫定還在尼雅和樓蘭發掘到為數不多的佛教藝術品。其中包括赫定在樓蘭找到的一個木刻門梁，上面裝飾有幾個佛像。

此外，中日共同尼雅考察隊在尼雅發掘出一個很有特色的佛殿。佛殿是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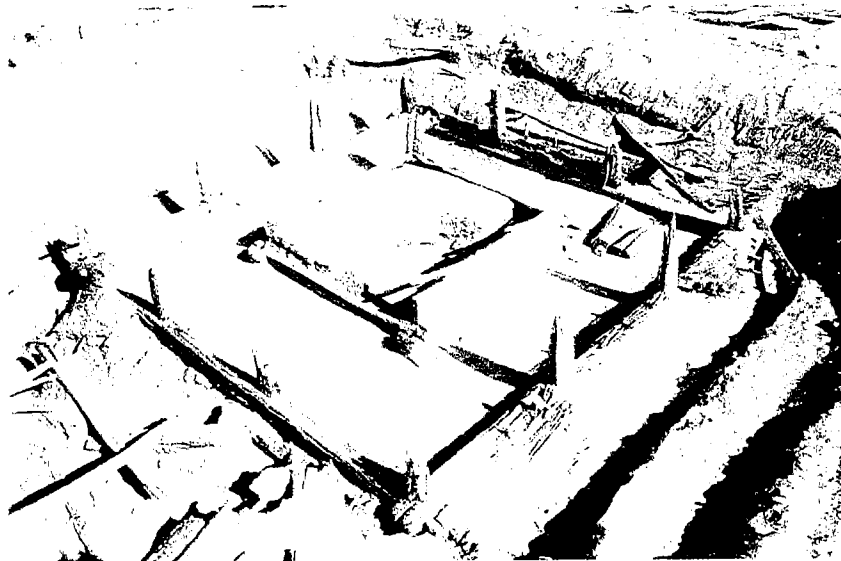


圖5 中日共同尼雅考古隊發掘的方形佛殿《新疆文物百跡大觀》圖版 0105

形的，長5.3、寬5.2米，面積28平方米(圖5)。一米多寬的走廊兩側下方畫有壁畫(圖6)，同時，該殿還出土了一些木刻佛像²⁹。在離尼雅不遠的于闐國的克里雅遺址也發現了同樣的方形佛教遺址。但不同於尼雅的是，克里雅的壁畫畫的不是本生故事而是畫單個的佛像，用的色彩也不多，代表了絲路早期的一種藝術風格³⁰。

假如用對西北印度的分析框架(analytic framework)來研究上述佛教遺址的話，那麼尼雅、樓蘭的佛教藝術並不難解釋：印度來的移居者到了尼雅之後，他們帶來了自己的語言、文字、宗教以及藝術風格。我們也可以根據當地所提供的資料重新構想當時精絕居民的宗教生活：當時僧俗并無清楚的分界綫；本地人與外來者都會去佛塔、佛殿拜佛；他們在家裏也可能擺小佛塔拜佛。

五 米蘭之美

除了尼雅與樓蘭的遺址之外，鄯善國還有一個佛教遺址：米蘭。1906年，斯坦因發掘米蘭佛殿時，他簡直無法相信展現在他面前的景象：“我幾乎以為我是站在敘利亞或羅馬帝國東部的別墅，而不是在中國國內的佛教聖所。”³¹米蘭與精絕不同；其遺址主要為佛教遺址。斯坦因在米蘭沒有找到居民區。米蘭的



圖6 尼雅方形佛殿中的壁畫《新疆文物百跡大觀》圖版 0108

十五個遺址中有三個重要的佛教遺址：M2、M3和M5。M2的作用不清，它規模大，長14、寬11米。其中的六個佛像的頭都掉在地上，剩下來的基座寬2米。M2還出土了用婆羅密(Brahmi)字體書寫的文書。因為佉盧文字體使用在前，婆羅密字體使用在後，我們由此可知此遺址的年代為公元400年左右。這些文書是文法書的殘片，這很引人遐思，當年是否曾有學生在此讀過書呢？

與米蘭不同，在精絕、樓蘭、克里雅沒有發現類似的佛像，而斯坦因只在于闐看到過如此龐大的佛教遺址。米蘭佛像遺跡後邊有一個很大的院子，斯坦因認為它很可能是寺院(vihara)。米蘭離鄯善國其他村落很遠，據我們現在所知，當地并無長期居民。若是如此，那麼米蘭是否有可能是淨修中心？也許我們可以把米蘭想象成這樣一處所在，周圍地區的佛教徒有時會離開家來此淨修。

米蘭的壁畫最值得我們注意。M3與M5兩處都是佛殿。土磚做的佛殿從外看起來是方形的，裏面是圓頂的，殿中有佛塔。可能當時拜神者進門後就繞塔而行。斯坦因在走廊上曾發掘到帶佉盧文字體的絲帛殘片。據波葉爾(Abbe



圖 7 米蘭 M3 出土的布製花的奉獻品
Aurel Stein, *Serindia*, volume IV, plate XL VIII.

Boyer)的解讀，它們記載了拜神者所許的愿望：我們奉獻此為求某人康健³²。斯坦因在米蘭發現佉盧文文書時非常興奮，這證明米蘭佛殿與尼雅的屬於同一個文化圈。

斯坦因在 M3 遺址還發掘到其他別具特色的供奉品，包括布做的花兒(圖 7)。這件物品是在一塊棉布上貼有布做的蓮花等水生植物，似乎朝拜者是用這些花兒、植物來組成一個聖湖。可以想象當時的拜神者是帶着布花兒以及寫着祈禱詞的帛絹到米蘭去。在繞行殿中的塔後，他們將帶來的供奉品留在裏面。一千五百多年之後，斯坦因在同樣的地方使它們重見天日。

M3 的壁畫很有特點。壁畫本身有上、中、下三層。上、中層保存得不好。從殘留的部分可以看出米蘭的壁畫與尼雅、克里雅的不同。尼雅、克里雅的壁畫畫的是單獨的佛，而米蘭壁畫畫的則是連續的故事。其中最完整的壁畫是關於釋迦牟尼與他的六個弟子的。這幅畫講述的很可能是本生(jataka)故事。斯坦因注意到同樣的人物形象出現在不同的壁畫中，據此他推斷米蘭的畫家以繪畫連續故事見長。

走廊外壁有四扇窗戶，窗戶之間有四塊壁畫，每塊壁畫的下部畫有六個生有翅膀的天使，四塊就共有二十四個天使。每個天使都占據一塊弧形空間，與尼雅、克里雅壁畫中的人物面孔不同。尼雅、克里雅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是狹長形的，而且雙目微合，而米蘭壁畫中的天使却是雙目圓睜。二十四個天使面



圖 8 米蘭 M3. viii 天使像壁畫
Aurel Stein, *Serindia*, volume IV, plate XL.

貌各異(圖 8)。這些壁畫給人的感覺是：當朝拜者在佛殿裏面繞行時，天使的眼睛追隨注視着他們。由於壁畫中這些天使的形象很西方化，所以斯坦因當時很奇怪羅馬的丘比特怎麼會出現在米蘭的佛教遺址內。

斯坦因在發掘 M5 佛殿時才明白了為什麼 M3 的畫家使用了弧形空間的設計。M5 的壁畫上部畫有本生故事，下部畫有花環，花環兩邊分別有樂女與小男神(圖 9、10)。我們在此不應該再稱此壁畫作者為 M5 畫家——因為他親自用佉盧文留下了自己的簽名：“此畫係蒂陀之作品，彼為之護般摩伽錢三千。”³³(般摩伽的意思不明，但無論如何，它應是指某種錢幣)蒂陀明顯不是當地人名，斯坦因當時立即視其為羅馬人，波葉爾也同意這種看法。由於該佉盧文簽名書寫得不正確，我們可以就此設想這是否說明蒂陀有可能是外國人³⁴。

無論如何，蒂陀是很有創造性的。直至今今天我們看他的壁畫的復印本時，還可以清楚體會到它們是多麼的栩栩如生。假如我們想找到類似的畫來進行藝術史比較的話，我們就必須去看羅馬帝國的畫。最適合的比較對象是位於羅馬帝國邊疆的城市——埃及的法余摩(Fayum)。法余摩有與米蘭佛殿壁畫類似的



圖9 米蘭 M5 的佛殿、走廊外層壁畫
Aurel Stein, *Serindia*, volume I, plate 129.

壁畫，也有與米蘭類似的多元社會文化。

六 米蘭與埃及法余摩的比較

假如我們想看與米蘭壁畫同時期的壁畫，羅馬帝國內的例子不多。因為多數早期的壁畫都喪失了，所以墳墓裏留存的壁畫極其實貴。埃及法余摩的墳墓是 19 世紀末發掘的。公元前 30 年，羅馬帝國統治了希臘托勒密王朝。法余摩出土的壁畫的年代是從公元 1 世紀到 3 世紀。當時法余摩有埃及人，也有希臘人，同時還有少數羅馬人。據戶口統計記錄，三成法余摩人是希臘籍，七成爲埃及籍。埃及史學家發現埃及人與希臘人并非互不往來。希臘人經常娶埃及人爲妻，但他們的孩子還是按希臘籍寫進戶口本。法余摩人的宗教信仰和早期埃及人相同：他們把屍體做成木乃伊，再將木乃伊放在棺材裏，最後將一副畫貼在棺材外邊(圖 11)³⁵。

我們看現存法余摩的一百幅人像，就好象見到了蒂陀壁畫中天使的親戚。它們的形象很相似，人物都是雙目圓睜，大鼻子，目視前方。顯然兩者的作畫



圖 10 米蘭 M5 壁畫局部
Aurel Stein, *Serindia*, volume I, plate 135.



圖 11 法余摩出土的一副貼畫的棺材及放大的畫像
Susan Walker(ed), *Ancient Faces: Mummy Portraits from Roman Egypt*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0), Plate 9 with detail.

技巧有所不同，法余摩的藝術家用蛋彩畫法 (tempera) 或臘畫法 (encaustic) 在木板上作畫，而蒂陀則是直接用筆在濕的壁畫板上作畫。因此法余摩壁畫的綫條比蒂陀的更細些，但最終達到的藝術效果的真實性則大同小異。

法余摩的藝術家使用羅馬的藝術風格來畫埃及的木乃伊人像，米蘭的蒂陀用羅馬的藝術風格來畫佛殿裏的本生故事壁畫。這兩個例子可以使我們看出羅馬的藝術風格是如何傳播到遠方的。在這個問題上，斯坦因與波葉爾都側重強調蒂陀個人的作用。他們認為是蒂陀個人將羅馬的藝術風格從羅馬帶到了米蘭。鄯善國的一些出土文物很明顯地顯示出受到羅馬藝術風格的影響，因為公元 3、4 世紀有羅馬或敘利亞的商人去鄯善國做過買賣，那麼，蒂陀是否有可能是陪西方商人去尼雅的呢？

呢？

另外，鄯善國官員經常使用刻有希臘神像的圖章。斯坦因在圖章中辨認出許多希臘的神。那麼鄯善國的官員是否信仰這些古代希臘的神呢？我估計他們并不信仰，而是讓刻圖章的人模仿移居者帶來的圖章樣子去刻這些希臘神像。如我們所知，佉盧文文書不曾提及任何希臘神祇。因此在尼雅圖章上的希臘神像應該是外來移居者帶來習俗影響的殘留遺像。

結 論：尼雅研究的啓示

爲了進一步瞭解漢唐之間中印邊疆的文化互動與交融史，我們應該回到我在本文開篇時提出的關於尼雅學的四個基本問題。

第一，爲什麼當地人使用印度字母書寫文書？早期的學者都認爲是由於貴霜帝國曾統治過尼雅，因此當地居民用佉盧文文字來寫文書。但是近三十年來的研究糾正了他們的看法。現在我們知道尼雅居民經過與犍陀羅來的移民互動與交融，採用了印度文字來書寫行政文書。研究尼雅史料學者之間的論爭也提醒我們注意，我們不能僅憑某一種語言文書的存在來斷定當地統治者是誰。尼雅出土的文書中有佉盧文的，也有漢文的，但事實上當地統治者既不是貴霜王朝，也不是中國漢王朝，而是當地原住民。

第二，尼雅原住民是誰？佉盧文文書記載的人名告訴我們他們是說吐火羅語的人。對尼雅的研究可以使我們意識到另外一個關鍵問題：在研究本來無字母的民族時，不應該忽略古代社會的多元性。尼雅社會有使用犍陀羅語的外來者及其他社會成員：山地人、于闐人和漢人。由此可清楚地看出，當時精絕的人口雖然只有幾百戶，但却明顯地是一個多元社會。

第三，尼雅的原住民是否信奉佛教？尼雅研究給我們的第三個啓示是關於宗教生活方面的。我們切不可祇憑陪葬品來分析推斷當地的宗教生活，因爲這樣做只會使人得出片面的印象。同時，只根據地面上的建築遺址來研究這一課題也會使人陷入同樣的誤區。只有將地下和地上的文物全面綜合起來，同時進行研究，我們才有可能理解當時、當地的宗教生活的多元性。尼雅居民在地下建造傳統模式的墳墓的同時，他們在地面上修建的則是不見於墳墓中的佛教建築。尼雅居民信奉佛教的方式很有特色，特別是俗家佛教徒參加所有的宗教活動這一點。當時的佛教藝術同樣很有特色，具有多元特徵，例如，蒂陀就是借用了羅馬的藝術形象來創作米蘭佛殿裏的壁畫的。

鄯善國既然是多元社會，該國居民的宗教生活也是多元的。在犍陀羅移民未到來之前，本地居民應是崇拜本地神的，根據是他們在歐德墓地擺過本地神

的雕刻塑像。犍陀羅移民到來以後，他們的佉盧文文書提到過本地居民相信巫祝或預言者等宗教習俗。關於鄯善國其他民族的宗教習慣，佉盧文文書裏並無記載。山地人拜何神？于闐人拜何神？臨時去尼雅的漢商人和長期駐紮樓蘭的漢軍人拜何神？蒂陀本人拜何神？關於這些問題的答案，也許我們永遠不得而知，但重要的是我們切不可簡單認定他們都信仰佛教。生活在多元社會裏的人雖然會受他人信仰的影響，但是很少會完全放棄自己原有的信仰。

在尼雅研究百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無法解答的問題仍然很多！儘管如此，迄今為止的尼雅研究還是很有成果的。現在我們知道了過去的分析方法太過簡單。如果我們要真正地瞭解兩種或多種社會之間的接觸交往，就不能簡單地使用“侵略”、“統治”或“漢化”這些傳統的、過於籠統的模式，而應該更多地採用互動與交融這一模式來分析歷史上的多元社會之間的交流。

我要感謝郭海妮女士幾次校正和潤色了文稿。

- 1 Aurel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John Brough, "Comments on Third-Century 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8(1965), 582-612;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Kaniska," in A. L. Basham (ed.)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ska* (Leiden: E. J. Brill, 1968); Douglas A. Hirth, "Kushan Tarim Dominatio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2(1988), 170-192; 王炳華《貴霜王朝與古代新疆》，《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35-38頁。
- 2 莫任南《東漢與貴霜關係史上的兩個問題》，《世界歷史》1981年第2期，67-74頁；孟凡人《貴霜統治鄯善之說純屬虛構》，《西域研究》1991年第2期，29-40頁。
- 3 Nicholas Sims-Williams, "Part I: The Rabatak Inscription, text and commentary," *Silk Road Art and Archeology* 4(1995-1996), 77-96, 引文載於78頁。
- 4 Joe Cribb, "Part II: The Rabatak Inscription, its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and numismatic context," *Silk Road Art and Archeology* 4(1995-1996), 97-102.
- 5 《後漢書》卷77, 1580頁；桑原鷲藏《張騫の遠征》，《桑原鷲藏全集·第三卷》，東京，岩波書店，1968, 261-335頁；羽田亨《大月氏及び貴霜に就いて》，《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歷史篇》，東京，東洋史學會，1957, 538-561頁。
- 6 Brough, "Comments on Third-Century Shan-shan," 599頁。
- 7 馬雍《新疆所出佉盧文書的斷代問題》，《文史》1979年第7期，73-95頁；林梅村《佉盧文時代鄯善王朝的世系研究》，《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39-50頁。
- 8 林梅村《尼雅新發現的鄯善王童格羅伽紀年文書考》，《西域考察與研究續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 9 林梅村《貴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國考》，《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語言和宗教新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

- 10 Rhie, Marylin Martin, *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Volume One. Later Han, Three Kingdoms and Western Chin in China and Bactria to Shan-shan in Central Asia* (Leiden: Brill, 1999), p. 361.
- 11 T. Burrow, "Tokharian Elements in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5: 675.
- 12 T. 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0) Document#386; 林梅村《沙海古志：中國所出佉盧文書（初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107頁。
- 13 T. 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Document # 35; 林梅村《沙海古志》，50頁。
- 14 Stein, *Serindia*, pp. 217-219; E.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Imprimerie de l'Universite, 1913) 圖 XXXI; 林梅村《樓蘭尼雅出土文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88頁。
- 15 王國維《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3冊，17卷，833頁。
- 16 Folke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Volume VII. Archaeology I. Publication 7 of 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 (Stockholm, Bokforlags Aktiebolaget Thule, 1939).
- 17 由於歐德墳墓與 Qawrighul 古墓墳墓場有很多類似的入葬習慣，因此一些考古學家猜測這兩處墓場的主人是屬於同一民族的。見 Karl Jettmar, "Archäologie in Xinjiang and ihre Bedeutung für Südsibirien—eine Bestandsaufnahme," *Beiträ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äologie* 12(1992): 141-142.
- 18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68-70頁。
- 19 見上文 67-69頁。
- 20 見上文 85-86頁。
- 21 見上文 55-57頁，圖版 XX。
- 22 王炳華《尼雅考古百年》，《西域考察與研究續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179-180頁。
- 23 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Document#157.
- 24 見上文 Documents#63, 58.
- 25 見上文 Document#248.
- 26 王炳華《尼雅考古百年》，178頁。
- 27 見上文 176頁。
- 28 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Document # 486; 中文翻譯由林梅村先生提供。
- 29 《新疆文物古跡大觀》，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圖 0108; 中日共同尼雅遺跡學術考察隊《中日共同尼雅遺跡學術調查報告書·第一卷》，京都，1996年；中日共同尼雅遺跡學術考察隊《中日共同尼雅遺跡學術調查報告書·第二卷》，京都，1999年。
- 30 Corinne Debaine-Francfort, "Agriculture irriguée et art bouddhique ancien au coeur du Taklamakan (Karadong, Xinjiang, IIe-IVe siècles)," *Arts Asiatiques* XLIX(1994), 34-52.
- 31 Aurel Stein, *On Central Asian Tracks: 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editions in Innermost Asia*

- and *Northwestern Chin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4), 110.
- 32 A. M. Boyer, "Inscriptions de Miran," *Journal Asiatique* (1911) 413-430.
- 33 林梅村《沙海古志》，320-321頁。
- 34 Aurel Stein, *Innermost Asia*, 531.
- 35 Susan Walker, *Ancient Faces: Mummy Portraits from Roman Egypt*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0).

What We Can Learn from One Hundred Years of Studying Niya (Summary)

Valerie Hansen
(History Department, Yale University)

Since Sven Hedin's 1900 discovery of the site of Loulan in Xinjiang, northwest China, and Aurel Stein's arrival at Niya in 1901,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have been poring over the materials from the three important sites of Niya, Loulan, and Miran. Although from different locations, the artifacts found at these sites show clear cultural similarities. The site that Aurel Stein excavated at Niya turned out to be the city of Jingjue as it was called in Chinese, or Kroraina in Gāndhārī, the Indic language used in the kingdom of Shanshan during the third and fourth centuries A. D. Although the artifacts found at Niya and Loulan are not as stunning as those found at other Silk Road sites, the unique combination of documents and artifacts found at Niya has excited the interest of many scholars.

As soon as Aurel Stein saw the first documents written in the Kharosthī script, he grasped their enormous significance. Why did the local people use an Indic script to write documents? Who were the indigenous residents of the site? Did they believe in Buddhism? These are very basic questions, but even now, one hundred years after Stein arrived at Niya, scholars have yet to reach a consensus about them.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tentative answers—in the hope of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s and mixing that occurred on the border of India and China.

How Can We Explain the Presence of the Kharosthī Documents?

Although earlier researchers have assumed that the Kharosthī documents indicated that the Kushan empire conquered the southern Silk Road (from Niya to Loulan), there is no clear evidence showing that the very weak Kushan empire ever controlled the southern Silk Road. Rather, the Kharosthī documents and wood carvings with Indian motifs (Fig. 1 and 2) point to a large-scale migration from the Gandhāra region of northwest India. Both the Niya and Loulan sites also produced Chi-

nese-language documents. The Niya documents, numbering no more than twenty, are linked to the practice of gift-exchange within the ruler's immediate family, probably at the time of Chinese New Year; the Loulan documents record the day-to-day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garrison stationed there.

The Kharosthī documents reveal that the Chinese presence at Niya was limited. One court case involving the price of silk instructs the plaintiffs to wait for the time when Chinese traders will arrive—a clear indication of their seasonal presence. The Kharosthī documents contain many transcribed personal names of rulers and officials. Thomas Burrow demonstrated in 1935 that these names showed clear Tocharian linguistic markers, and he suggested that the ruling stratum at Niya continued to be Tocharian-speakers, even after the migrants from Gandhāra had settled in the region.

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from Niya cautions us against leaping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 given archeological settlement—no matter how small—was occupied by only a single people with a uniform culture. The small town of Niya, where less than two hundred dwellings have been found to date, was home to hill people and Khotanese refugees, in addition to the Tocharian speaking locals, the Gāndhār-speaking immigrants, and the occasional Chinese traders. The only word for such a community is multi-cultural.

Material Life at Niya Before the Immigrants Arrived

Evidence from graves, some excavated by Sven Hedin and his collaborator, the professional archeologist Folke Bergman, in the 1920s and 1930s, and some excavated by the joint Sino-Japanese expedition in the 1990s, shows that the people of Niya and Loulan buried their dead with figurines of spouses (Fig. 4) and provisions for the afterlife. Bergman found some statues in a graveyard that may depict gods worshipped by the local people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immigrants from Gandhāra (Fig. 3).

What the Kharosthī Documents Reveal About Religious Life

The Kharosthī documents provide a few tantalizing mentions of local religious practices along with much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local Buddhist community. Two documents mention witches, while another gives official authorization for an offering to be made to a deity presiding over a bridge. Members of the Buddhist community at Niya, called sramana in the texts, owned both slaves and land. They had families, and they adopted children and put their own children up for adoption.

They met on certain festivals, when they were supposed to wear their robes, but they lived at home with their families. The local officials treated them as a separate legal group, and they were authorized to adjudicate their own disputes.

Above-ground Religious Life

A large Buddhist stūpa towered above the Niya site, prompting Stein to call the town a “Buddhist kingdom.” Although Stein found no other Buddhist ruins, the Sino-Japanese expedition uncovered an unusual square Buddhist hall (Fig. 5) with Buddhist wall paintings (Fig. 6).

The Beauty of the Miran Site

Stein did, however, discover the extraordinary Buddhist complex of Miran, which lay halfway between Niya and Loulan. He was particularly struck by the votive offering of a picture of a sacred lake and flowers (Fig. 7) he found in the circular path around the central stūpa at the M3 Buddhist ruin. Cloth offerings with Kharosthī inscriptions voicing the wishes of their donors for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made it possible for Stein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Miran ruins dated from the same period as the Kharosthī documents from Niya. At M3 Stein found paintings of angels with distinctly Western features (Fig. 8), and he discovered why they seemed so Western when he excavated the Buddhist building M5 (Fig. 9) with its wall paintings (Fig. 10). An artist named Titus signed the paintings at M5, leading Stein to speculate that Titus had come directly to Miran from Rome. We might more cautiously conclude that Titus's paintings at Miran show the existence of a cultural sphere that extended all the way from Rome to Niya in the east and Fayum, Egypt, in the south. Paintings excavated from Fayum (Fig. 11) show strong stylistic similarities to those from Niya.

Conclusion: What We Can Learn from Niya

It made perfect sense for Aurel Stein to conclud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at the Kushan empire had ruled Niya directly, that only one people lived in the site, and that everyone was Buddhist. Now that the Kharosthī documents have been deciphered and translated (by Burrow into English and Lin Meicun into Chinese) we realize how much more complex Niya society was. Although home to several hundred people, Niya was a multi-cultural, multi-lingual society in which people who spoke different languages lived together.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Niya

spoke Tocharian but had no written language. When the immigrants from northwest India arrived, they quickly adopted the Kharosthī script for the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Although much material evidence of Buddhism survives, we cannot conclude that the residents of Niya all shared the same religious beliefs. The indigenous Tocharian speakers, the immigrants from India, the itinerant Chinese traders, the elusive hill people, and the Khotanese refugees must have all had their own religious practices. As they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at Niya, we can assume they adopted certain religious practices from their neighbors while retaining some of their own traditions.

What can Niya teach us? To abandon our old-fashioned and simplistic models of conquest and control in which one people completely eradicate the religious practices, language, and customs of others. Instead, remember Niya. There,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centuries, at least five different communities, each with its own language, coexisted as they lived in the one of the world's earliest documented multi-cultural societies.